

# 从解缙《大庖西封事》看明初君臣关系的实质

穆永强

(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法学系,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大庖西封事》反映了解缙用儒家的仁政补救朱元璋以猛治国的弊病的观念。解缙以上古三代的王道政治为太平治世的标准来指陈时事,因此其建议和主张颇具复古主义的色彩。封事反映了明初皇权高度膨胀背景下君臣关系中君尊臣卑的实质。

**关键词:**解缙;大庖西封事;君臣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30(2013)02-0101-03

收稿日期:2012-10-26

基金项目:2011年兰州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基金

作者简介:穆永强(1975—),男,吉林松原人,讲师,主要从事法律文化与法律史研究。

## 一、解缙上呈《大庖西封事》的背景

解缙(1369—1415),字大绅,江西吉水人。吉水解氏家族自从唐朝以来世代居住在吉水鉴湖南山之下,在解缙的后代清朝人解悦编《文毅集》卷五中,解缙自称解氏家族享有“山林城市寻常屋,唐宋诗书第一家”之美誉,堪称名门望族。解缙的祖父为元代进士,父亲解开为元代大儒,母亲为进士高若凤之女。

解缙自幼聪慧异常,七岁就能做诗,且出语不凡,有神童之称。洪武二十年(1387)年,未弱冠的解缙在江西乡试中拔得头筹,转年会试礼部中第七,殿试时被抑置三甲。朱元璋授予他中书庶吉士,让他一边在中书科担任中书舍人观政实习,一边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内的“中秘书”里深造学习。

解缙视朱元璋为千古一遇的帝王,他在登第后的一封家书中表达了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情:

自从到此忽三月,每日扬鞭历城阙。生逢尧舜难自弃,况有门户凭谁撑,古云学非以干禄,但愿无忝尔所生,天生富贵时与命,岂肯逐逐为纵横,况闻进锐者退速,人有高才须检束。千金万户皆外物,岂以外物伤天真。诸兄历落俱群仙,明珠孕蚌发光彩。<sup>①</sup>

朱元璋自然也希望解缙这样的才学之士能为其所用,于是将中第刚刚一个月的少年才子叫到大庖西室,并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尔试举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闻。”<sup>②</sup>

皇帝的这一番话别有深意:一方面,二人是尊卑有序的君臣关系;另一方面,朱元璋“取天下于群盗,救生民于水火”,这种丰功伟绩对于普天下的黎民百姓来讲,可谓功德无量,真可比拟父母的养育之恩。单单“恩同父子”这几个字,就使年幼的解缙多了几分直言的勇气和力量。

解缙以唐虞三代“更相劝戒,更相推让”契符鱼水的君臣关系为理想,因此不愿与魏征同列,而愿与上古三代的谏诤名臣皋、夔比肩。他也希望

朱元璋能够“同符尧舜,师表百王”。这样,他和朱元璋之间的君臣关系就颇具理想化的色彩,作为臣子的他就更应该对皇帝讲一些实话。皇帝也不会“毋自狭小”,担当拒绝纳谏的恶名。饱读诗书的解缙非常清楚比干、屈原等谏诤直臣以言取祸的结局。此外,他的祖辈解谷曾因痛斥奸臣贾似道而被谪处于家。所以,他在步入政坛之始,定下这样的基调,实在不失为聪明之举。

在朱元璋的鼓动下,解缙进上了这篇著名的《大庖西封事》。“封事”就是有重要的事情写好后,装入一个黑色的袋子,贴两道封条,密奏给皇帝。解缙直陈政事,迎合了朱元璋“知无不言”的要求。由于当时的人都不敢上书直指时弊,解缙痛快淋漓的直陈让明太祖感到一种新鲜的感觉,同时心里也感到高兴,便将“封事”公诸于众,解缙因此名声大噪,朝野闻名。

## 二、《大庖西封事》的主要内容

解缙的这篇封事的内容包罗广泛,诸如法令制度、礼乐祭祀、文献制作、学校科举、宗教礼俗、乡约家范、赋敛科课等。

在奏议中,解缙指出朱元璋“一统华夷,女宠、外戚、寺人、藩镇之患消融底定,功高万古”,得国之正,非汉、唐、宋能比。这表明解缙头脑中儒家正统论的思想根深蒂固。

朱元璋以淮右布衣参加元末农民战争,采纳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并听从儒士李善长的劝告,效仿汉高祖“以不嗜杀人得天下”,历经十几年的征战,完成了从农民起义军领袖到封建皇帝的蜕变。

解缙认为,在“得天下”这一点上,朱元璋并不比儒家奉为圣王的尧、舜逊色,但是,当今皇帝治理天下的诸多具体措施距离儒家的理想还相去甚远。所以,他在充分地肯定了朱元璋的功绩

① 《文毅集》卷4《寄族中诸昆弟》。

② 《文毅集》卷1《大庖西封事》。

之后,又展开了对现行制度和施政措施的批判。

解缙认为,贵为天子一定要讲求诚信,否则不足以师表万民,希望朱元璋“笃悫信之本,加慎独之功”。意思是说,皇帝的儒家修养功夫做得还远远不够,先思“内圣”何以“外王”?他严厉地批评皇帝猜疑过重,屡变法度,“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良由诚信有间,用刑太繁。”解缙的批评真是一针见血,直截了当。从明初皇权膨胀、万马齐喑的言论环境和君尊臣卑的历史背景而论,他的勇气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此种批评将使自已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很有可能因为触犯九五之尊的威严而导致官职不保,甚至掉脑袋。

在明初法禁松弛的情况下,朱元璋申明法纪有其历史必然性。而在深受儒家“尚德缓刑”、“明德慎罚”思想熏陶的解缙看来,朱元璋用刑太过,矫枉过正。明初,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宿将,先后有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诛戮数万人之多。人们都说“世不绝贤”,朱元璋却感到国家缺乏忠良之才,解缙认为,主要根源在于朱元璋的内圣修养功夫欠缺,对士大夫的诚信不够,任喜怒为生杀。士大夫认为朱元璋离他们心目中的明君标准还有相当距离,臣子能够事君以忠,但是皇帝却不能待臣以礼。这样,解缙将明初君臣之间的不信任、不和谐局面归咎于皇帝。他认为是皇帝的猜忌心太重,皇帝不信任臣子,且不能以儒家君臣之礼待臣子。

接下来,解缙痛陈朱元璋重典治国的诸多弊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大权独揽。法度屡变,政令不一,只知“除奸斩恶,除根剪蔓”,从不奖善,“或朝赏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以致“善者未必蒙福,恶者未必蒙祸”,不能扬善抑恶。士大夫随时有可能被施以不测之辱,甚至朝不保夕。解缙在直陈朱元璋以猛治国的弊端的同时,一再强调和肯定朱元璋重典治国的初衷是扬善抑恶,只不过施政过火,事与愿违。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解缙如此直言不讳,显扬君恶,多半是自身难保。战国策中的名篇《邹忌讽齐王纳谏》形象地描述了谏诤之臣在劝谏皇帝改正不恰当的做法时应该注意的修辞技巧,也突出了君尊臣卑关系之下,谏臣在指陈皇帝过失时如何能够保全君主的面子和威严这一难题。而解缙可以说完全没有使用此种修辞技巧,对于可能触怒君主无所顾忌。这突出地反映了少年才子解缙的锋芒和锐气。

解缙反对重刑治国,主张道德教化先于刑罚的使用。针对皇帝以严猛治国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给出的办法是从周公到孔子所大力提倡的“明德慎罚”这一治国方略。儒家讲求内圣外王之道,在解缙看来,皇上的内圣功夫欠缺,所以建议皇帝“加密存养之功”,尤其是儒家的“慎独”之功,最为切要。儒家经典《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解缙建议皇帝要多读儒家经典。在“崇正学、辟异端”的解缙看来,《说苑》、《韵府群玉》、《道德经》、《心经》诸类杂书,实在不适合天子御目,尤其是佛家和道家的书荒诞不经、坏人心术。国家既然以儒道治天下,天子当然要读儒家所推崇的古圣先王的经典之作,尤其是作为道学之本的“六经”更是不可不读。解缙在这里极力捍卫唐代韩愈所推崇的儒学道统论。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但是,

明初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尚未牢固地树立起来,朱元璋也受到儒家以外的道家思想的很大影响。因为朱元璋的出身低微,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其思想驳杂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是通过科举中第、熟读儒家四书五经的解缙所忧心忡忡的事情。

解缙的封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关于“肇起文献”的建议,这符合儒家礼乐治国的理想。他建议编辑一部历代汇集儒家经典作品的类书。解缙非常清楚,在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宰辅专政格局形成的过程中,理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出于致君尧舜的考虑,主动提出编辑一本“随事类别以劝戒”的类书“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华奥,下及关、闽、濂、洛之葩根。”也就是要编一部从古代至宋代的儒家治国精要。这部类书在朱棣统治期间由解缙主持完成修纂,即《永乐大典》。明朝建立前后,朱元璋曾经征辟山林隐逸之士,开礼、乐二局,修成了号称“煌煌大典”的《大明集礼》一书。为了响应皇帝“稽古右文,肇起天朝文献”的号召,解缙还建议要删定汉儒编辑不精的《礼经》,重新编辑亡佚的六经之一的《乐经》。

解缙建议通过祭孔以统一君民的思想。全国自天子到平民百姓,都要祭祀先师孔子。此外,关于尊祖祀天,他认为“尊祖宜备七庙之制,祀天宜复扫地之规”,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拜祭者的虔诚,也才能师表万民。

解缙充分肯定了其政权的合法性,认为朱元璋“天性素严,合于道微”。但是,他同时批评皇帝求治过急,用刑太繁。他特别指出,大臣“有过恶当诛,不宜加辱”,尤其应当废除“廷杖”一类的法外威刑。解缙指出,前朝君主对待大臣还是比较尊重的,至少没有象朱元璋一样滥施廷杖、侮辱群臣。朱元璋重刑治贪治吏,导致君臣关系非常紧张,很多官员每天上朝时和家人有如诀别,很多知识分子甚至为了明哲保身而退隐山林。解缙揭示了朱元璋的严猛治国方略给士大夫心理造成了严重的阴影。

饱受儒家仁德思想熏陶的解缙认为,皇帝当今一味以重典治民、治强暴的办法都是舍本逐末之举。“簿书之期,狱讼之断,诏诰之勤,勾奸之巧”这种种措施其实都不是治理百姓的根本办法。当今圣上民本思想阙失,只知道“畏天畏鬼神,而畏民者未至”。所以他引用《论语》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先师孔子的话“惟一于敬,则心即天”,强调民心向背和天意的统一。意思是说,皇帝如果失去民心,便会失去天下。解缙非常清楚,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一直是对皇权相对有效的制约手段。而明初自废除中书省、罢丞相之后,“事皆朝廷总之”,朱元璋大权独揽,臣民完全成了皇帝可以任意处置的奴仆。君臣之间权力格局的平衡局面被打破,皇权极度膨胀。

解缙认为,台纲不肃是人臣进谏困难的主要原因。他指责都察院和十三道监察御史作风不正,起不到纠恶扬善的作用。作为天子耳目的御史,完全从个人升迁的角度考虑,迎合皇帝心理,“以刑名轻重为能事,未闻举善,但曰除奸”。而“祸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亲友”的连坐之法,导致人人以言为讳,谁还肯批龙鳞、逆圣听?台纲不肃就不能激浊扬清,整个社会的是非道德标准就会错乱,国家还何以求治?

解缙批评朱元璋的用人政策。知人善任关系到吏治的好坏。解缙认为国家人才缺乏的原因在于皇帝“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轻重”,以致于贤者不是困于州县,就是屈于下僚,庸人却居

高位。此种现象确实存在。此外，皇帝重典治国，政治异常暴戾，这恰与士人宽仁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因此，士人大多秉承“国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信条。

解缙批评朱元璋“神道设教”的作法实际上是愚弄天下百姓。他认为，如今天下一统，根本不必求神问鬼。朱元璋“神道设教”的做法，实际上反映了他对皇位合法性缺乏信心。解缙把握了皇帝的这种心态，肯定了朱家天下不仅合法，而且“得国最正，唐宋莫及”，即所谓“得其真符者”。朱元璋之所以对于年轻才子的封事犯颜表现得异常大度，恐怕与解缙在朱元璋的政权合法性这一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不无关系。

赋税科敛乃国之大事，在奏疏中，解缙痛陈自洪武四年以来实行粮长制过程中胥吏欺民扰民的弊端，认为赋税的征收应该视土地肥瘠而有所差别，并且应该适当减轻人民的赋税和劳役负担，以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针对明初在土地分配及赋税征收方面存在的里胥舞弊等问题，解缙提出的措施颇具有复古主义的色彩，即“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义仓之举”。此种建议的确有不切实际的一面，但也反映了解缙关心普通百姓疾苦的情怀和立场。

### 三、朱元璋对封事的反映

这篇封事广为流传，收录于解缙文集《文毅集》和明人陈子龙选辑的《皇明经世文编》中，《明史》也有节录。这篇封事充分展现了才子解缙“率易狂愚，无所顾忌”的性格和不同凡响的识见，并且表达了其强烈的致君尧舜的忠君思想。总体说来，其主张不外乎用儒家的仁政补救明初“以猛治国”的弊病。解缙以上古三代的王道政治作为太平治世的标准来指陈时事，因此其建议和主张颇具复古主义的色彩，甚至有些不合时宜。

尽管朱元璋看到解缙的奏疏中颇多迂腐之处，但是认为其中“有足采者”，因此对解缙的批评表现得格外宽容。

朱元璋对于解缙的指责并未追究，也许还因为看到了奏疏中有人所不敢言之处，而这正表明解缙是不随流俗的正人君子。朱元璋自然能够

辨别小人和君子，并且希望他的臣子都能成为忠心耿耿、不党不私的正人君子。

年末弱冠的解缙的大胆直言令朱元璋耳目一新。皇帝已经许久没有听到这样的逆耳忠言了。十二年前，朱元璋曾因星变诏求直言，一个叫叶伯巨的平遥训导犯颜直谏，也是洋洋万言，指斥朱元璋治国方略之失：“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有三：曰分封太奢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当时的朱元璋勃然大怒，以离间骨肉之罪逮之下狱。时隔十二年，解缙再一次发出类似的声音，只不过吸取了叶伯巨的教训，对于敏感的分封事宜闭口不谈，而且非常重视劝谏的方式，总是欲抑先扬。天下人都说朱元璋任喜怒为生杀，解缙却为朱元璋辩护，说责任在缺乏忠良之臣。所以明人林之盛曾经评价解缙“聪明善悟主”<sup>①</sup>实在是颇有道理。这一点在后来的立储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尽管解缙封事犯颜，但是朱元璋对他宠信有加，他从这番言词激烈的话语里听到了臣子的愚忠和来自下层民众的呼声。

此后不久，解缙又给朱元璋呈上《太平十策》，即参井田、均田之法；兼封建、郡县之制；正官名；兴礼乐；审辅导之官；新学校之政；省繁冗；薄税敛；务农；讲武。这次建言中规中矩，措辞也不十分严厉，其建议没有特别偏激的地方，皇帝比较容易接受。这两次上书均受到朱元璋的表彰，一时间解缙成为了皇帝身边的宠臣。

解缙上书《大庖西封事》成为谏诤文臣的典范，其所编辑永乐大典对中华文化的保存与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封建社会进谏困难，关键是在君尊臣卑的等级秩序下，“位卑言高则为罪”。因此，敢于批逆鳞心的谏官都是“披腹心，效愚忠”，置生死于不顾。解缙后来就是因为卷入朱棣朝立储之争而被封建专制皇权所扼杀。

明史专家商传考察了以解缙为代表的明初文人求仕的心态以及当时强化专制主义皇权作法的格格不入的事实，认为这才是导致解缙悲剧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解缙代表了元末明初学风的尾声，他不能适应时代对他的改造，因此只能走上一条绝路”。一代才子解缙，在尚未到达知天命的年纪之时，的确在明初专制皇权高度强化的历史背景下，如巨星陨落，让后人唏嘘不已！

【责任编辑 朱世广】

## Insight into the Substanc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arch and Minister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from Xie Jin's Da-Pao-Xi Memorial to Throne

MU Yong-qiang

(Department of Law, Faculty of Humanities,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Gansu)

**Abstract:** Da-Pao-Xi Memorial to throne reflects an ideal of benevolent politics to remedy the concept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the emperor Zhu Yuan Zhang with fierce penalties. Criticism of current affairs by Xie Jin was based on benevolent politics in three Ancient dynasties, so his suggestions and ideas seems like a revivalist color. Da-Pao-Xi Memorial to throne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in which the emperor is noble and ministers are inferior in the background of highly inflated imperial power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monarch.

**Key words:** Xie Jin; Da-Pao-Xi Memorial to Throne; Monarch-Subject Relationship

<sup>①</sup> 《国榷》卷16。